

打造更具全球竞争力的 数字国际供应链平台

张荣楠

(中国国际经济交流中心)

【摘要】随着数字驱动全球化进程的不断深入，数字国际供应链时代正加速到来。文章深入阐述数字国际供应链平台的演变趋势与内在逻辑，剖析数字国际供应链平台面临的机遇与挑战，并提出应着力拓展数字国际供应链海内外战略布局，加紧制定完善优化数字国际供应链的政策体系，推动并引领形成全球数字供应链与经贸规则新框架。

【关键词】全球供应链变革；双循环；

数字国际供应链平台

【中图分类号】F274；F276.3；F49

随着数字驱动全球化进程的不断深入，数字化国际供应链时代正加速到来。作为由经济全球化与数字变革催生的新模式，数字化国际供应链对构建双循环新发展格局意义重大。面对全球供应链格局加速演变的大背景，我国应着力打造数字国际供应链平台，拓展数字国际供应链海内外战略布局，加紧制定完善优化数字国际供应链的政策体系，推动并引领形成全球数字供应链与经贸规则新框架。

一、全球供应链格局大调整下打造数字国际供应链平台战略意义凸显

随着全球经济、世界政治以及国际关系的深度变革，全球供应链正在经历着重大调整，原有的地理分布、利益分配和产业分工都在发生快速变化，对全球供应链分工及其竞争格局产生深远影响。

(一) 全球供应链竞争格局面临重大调整

当前，全球供应链正处于深刻调整期。近年来，日益严峻的逆全球化浪潮、中美博弈持续升级、新冠肺炎大流行、全球物流梗阻，以及乌克兰危机等地缘政治冲突对全球供应链重构产生了深远影响。全球供应链重点正由“效率优先”转向“安全优先”，并呈现出内向化、区域化、近岸化、联盟化、集团化的趋势，这些新动向、新趋势对全球供应链安全，以及我国参与国际经济产业大循环带来了前所未有的挑战与冲击。总体而言，尽管基于资源配置效率、“成本——效益”等传统供应链构建原则仍将发挥重要作用，但保障本国关键产业、基础设施、原材料等供应链安全，提升供应链韧性正成为重要目标。美国、欧洲、日本、印度等经济体已对本国供应链战略与政策做出调整。基于国家安全等因素考虑，全球供应链正出现“改流”“回流”趋势，对全球供应链格局重构带来深远影响。

(二) 全球供应链迎来数字化变革

以数字化驱动为特征的新一轮全球化保持着高速增长，正在重塑全球化格局，国际贸易呈现出高度数字化特征。

一方面，贸易方式的数字化，信息技术与国际贸易各领域深度融合渗透，货物交付、支付结

本文作者张荣楠系管理科学与工程博士、经济学博士后，中国国际经济交流中心美欧研究部副部长，研究员/教授。主要研究领域：全球宏观经济、全球价值链与国际经贸战略、数字贸易等。

算、税收通关等环节向线上迁移（电子商务）。从全球市场来看，据国际咨询机构大观研究（Grand View Research）的数据，2020年全球B2B电子商务交易额达7万亿美元左右，预计2020—2027年的复合增速可达17.5%，约占全球电子商务交易的80%左右。尤其是全球疫情之下呈现逆势增长，截至2025年，全球将有近8成的B2B交易转向线上。

中国是全球跨境电子商务规模最大的经济体，新冠疫情冲击下中国跨境电商出口市场依然保持较强韧性。与全球相似，中国跨境贸易B2B也占主导地位。跨境电商进出口结构显示，中国跨境B2B交易占比近八成。从分布来看，中国是亚太地区最主要的市场，跨境电商贸易伙伴已覆盖全球220个国家和地区。根据相关机构预测，2021—2025年，中国B2B跨境市场将会以25%的复合年均增速增长至13.9万亿元的市场规模（见图1）。

另一方面，贸易对象的数字化，互联网和信息技术为数字产品、数字服务和数据提供了高效便捷的传输通道，数据和以数据形式存在的商品、服务可贸易程度大幅提升，数字贸易成为国际贸易的新兴业态。联合国贸易暨发展会议（UNCTAD）数据显示，2010—2020年，全球可数字化服务出口规模由1.87万亿美元增至3.17万亿美元，增幅近70%。

近年来我国数字贸易蓬勃发展，已成为全球数字贸易大国。从总体规模看，2011—2020年，中国数字贸易规模达2 939.85亿美元，从2011年的1 648.38亿美元增至2 939.85亿美元，年平均增长率达6.7%，高于同期服务贸易（4.4%）和货物贸易（2.8%），全球排名由第10位提升至第5位（见图2）。

数字技术的广泛普及与应用不仅会对传统国际贸易形态深远影响，也会重构全球供应链，改变全球供应链的运行模式，颠覆全球供应链的全球分布体系和利益分配格局。特别是百年未有之大疫情的影响，使传统供应链模式加速转向数字化供应链模式。

（三）数字平台成国际贸易与全球供应链新载体

近年来，全球贸易和国际供应链日趋平台化，数字平台正成为链接国际贸易的重要枢纽，以及助力企业深度融入全球供应链的重要载体。传统国际贸易中，商品、技术、资金等要素流动主要集中在大型企业之间。然而，随着数字技术的快速发展，全球贸易分工的门槛大大降低，中小企业可以通过数字平台更广泛地参与全球贸易与国际供应链合作。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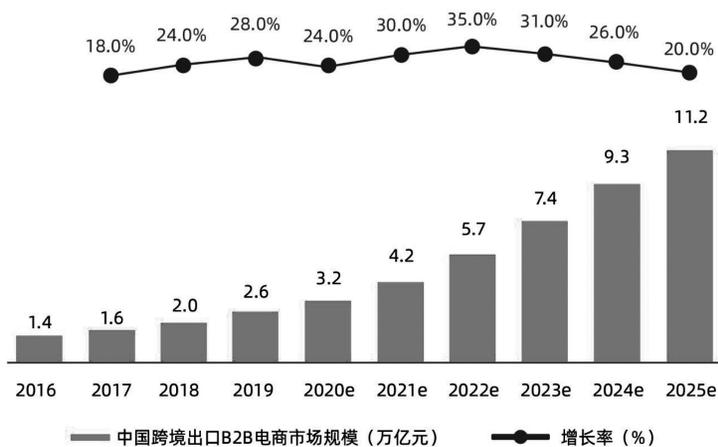


图1 2016—2025年中国跨境出口B2B市场规模及增速
数据来源：艾瑞咨询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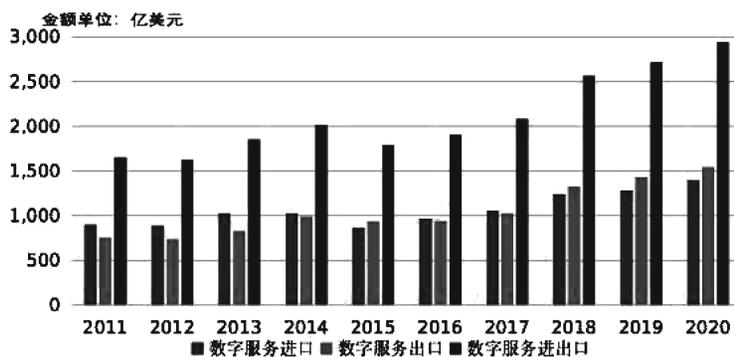


图2 2011—2020年中国数字服务进出口情况
数据来源：联合国贸易和发展会议（UNCTAD）

中国数字平台在跨境贸易综合服务方面走在世界前列，以阿里巴巴国际站、敦煌网、中国制造网等为代表的一批数字平台，通过大数据、云计算及SaaS化服务能力，提出涵盖通关、物流、外汇、退税、信保等全链路解决方案，降低了企业参与全球供应链与国际贸易的门槛，为企业出海提供一站式普惠贸易平台，助力中国制造出口产品附加值提升，产业向价值链上游攀升，为增强中小企业产业链供应链效率与韧性发挥重要作用。

表 1 部分国家主要跨境电商平台

国别	平台名称	业务范围及重点
中国	Alibaba.com	2600 万活跃企业采购商，覆盖全球 200 多个国家和地区，近 6000 个产品类别
美国	Amazon Business	亚马逊企业购服务全球逾 500 万家企业及机构客户，其中第三方卖家销售额占比超过 50%
韩国	EC Plaza	网站会员数量已超过 100 万，拥有超过 400 个供应商
新加坡	GlobalSources	大量中国（含台湾、香港）的制造商、供应商和分销商聚集在该平台
沙特	TradeKey	主打亚洲市场，特别是印度、中国、巴基斯坦、马来西亚和孟加拉等国家和地区
俄罗斯	Tiu.ru	俄罗斯最大的 B2B 平台之一，主要目标市场为俄罗斯、乌克兰、乌兹别克斯坦、中国和亚欧国家
印度	IndiaMart	印度最大的 B2B 交易平台，拥有超过 3500 万卖家，400 万供应商和 4300 万种产品
巴西	B2Brazil	巴西最主要的 B2B 国际贸易平台，超过 17 万家注册用户，大多数用户为中小企业

数据来源：根据公开信息整理

二、我国国际供应链及数字平台发展面临的风险挑战

（一）全球系统性风险陡升增加供应链脆弱性

近年来，围绕全球贸易的紧张局势加剧，新冠疫情大流行导致全球物流持续梗阻，以及俄乌冲

突为代表的国际地缘冲突频发，多重不确定性因素对全球供应链造成系统性影响，全球产业链退化、分割速度加快，供应链恢复难度增大。值得高度警惕的是全球供应链“去中国化”动向。国际金融危机后，美国等发达经济体相继推动“再工业化战略”引导制造业回流，并在疫情冲击下，针对关键供应链进一步实施供应链回迁和生产基地多元化政策，呈现“去中国化”指向。近年来，美国日益强化中国作为“系统性竞争对手”定位，“以链遏华”是其重要手段，特别是拜登政府以来美国在供应链领域加速采取行动，供应链“去中国化”迹象明显。在“脱钩”背景下，须重点关注相关产业“回流”“分流”“断流”的情形，未来中国如何应以国内市场为基础，继续通过全球分工体系以及数字化平台，利用国内国际两种资源，增强产业链供应链韧性是摆在我国当前的战略性议题。

（二）我国产业链供应链面临低端锁定的风险

总体而言，与发达国家相比，我国制造业“大而不强”，仍处于全球价值链中低端的境况并未根本改变，面临全球价值链下的“低端锁定”风险。2012 年以来，国内制造业处在增速换挡、结构调整的阵痛期，制造业增加值比重持续走低。我国制造业增加值占 GDP 比重从 2011 年的高点 32%，持续回落至 2020 年末的 26%。供应链是中国制造业的根基，如何从单点突破到整体突破面临重大机遇与挑战，其出路在于构建敏捷供应链、化解库存风险、提升价值链水平，根本方向在于基于数字化重构供需关系，实现高水平的供需动态平衡。

（三）国际物流成本依然居高不下

国际比较而言，虽然我国作为世界最大的产成品出口国和大宗原材料进口国，但与国际物流企业在我国境内发达的揽货服务网络对比，我国物流企业海外物流节点建设严重滞后，国际物流体系布局成为明显短板。长期以来，我国物流体系建设主要集中在国内物流，在国际物流中我国普遍存在受

制于人现象，大量依赖欧美日等发达国家的海空运力及国际货代能力，国际物流组织和服务供应能力偏弱。如，跨境进出口物流方式虽然选择多样，但都存在清关难、跨境跟踪难、物流成本高、运输时间长、货物损毁丢失、逆向物流难和物品限制多等方面的问题。相比于国内物流，跨境物流的运输距离更长，运输环境更复杂，因此在运输过程中面临供应链紧张以及地区冲突等不确定风险更高。中小企业国际物流成本居高不下。国际物流成本占跨境电商交易总成本的30%~40%。一些公共海外仓，大部分提供给大企业或跨国企业，中小企业在海外仓仓源方面，面临资源不匹配问题。

（四）数字国际供应链治理仍面临诸多难题与挑战

从外部挑战来看，在数字贸易与供应链领域，全球保护主义更趋严重，且全球尚未形成统一通用的国际规则标准。目前通用的《跟单信用证统一惯例》《联合国国际货物销售合同公约》《海牙规则》等传统国际贸易惯例或国际立法均不适用于跨境贸易监管、税收征收、结算支付等领域的法律依据，给各国海关等部门的监管执法带来了诸多难题。同时，数字国际供应链的标准规则、法律法规、监管制度等也远滞后于产业和市场的发展，各国围绕规则制定权的博弈更趋激烈。我国现有国内规则框架还不够完善，总体处于国际规则谈判的相对弱势地位。

从内部挑战来看，我国数字国际供应链各环节中仍面临诸多堵点与痛点，配套支撑体系不完善。如平台责任、知识产权侵权、争端解决效率低下、跨境支付兼容性较差、避险工具匮乏，监管体系不健全。一方面，在传统国际贸易中，国际货物买卖双方都有相对固定的贸易监管方式。但针对平台上的中小企业，传统的国际贸易监管缺乏便利的流程，增加了贸易成本，阻碍了全球普惠贸易进一步拓展。另一方面，小单化、多频次的交易特点给

各国海关和政府监管带来一系列挑战，要求各国政府加强合作，基于跨境支付、监管程序、关税等整个产业链上的各环节进行整体创新。此外，供应链模式与数字化技术融合度不高，信息孤岛、数字化基础设施薄弱、上下游企业缺乏联动等问题也制约了数字国际供应链快速增长的步伐。

因此，如何通过技术赋能、数据赋能、金融赋能、基础设施赋能以及一体化解决方案赋能；如何通过建立供应链上中下游，以及供应商、制造商、分销商、零售商之间的合作伙伴关系，使各节点企业之间的核心优势融合，形成生产商集成、供应商集成、中间商集成和消费者集成，进而打造出跨境供应链管理的整体竞争优势；如何整合进出口贸易、金融服务、物流仓储、通关服务、信息共享等全链路功能集成平台，促进国内外市场与资源有效整合，实现全要素、全产业链、全价值链的全面链接，有效服务于我国“双循环”新发展格局；如何形成与国际规则标准相互衔接、相互融合，甚至引领国际新一轮规则标准的制定就具有重大现实紧迫性与战略意义。

三、打造更具全球竞争力的数字国际供应链平台的路径与策略

数字化国际供应链是打造国内国际双循环的战略枢纽，以及推动贸易数字化转型的主要推动力，需要更多的战略指引与政策支持，形成充分发挥我国特色优势并引领全球供应链创新发展的新路径。

（一）加强数字国际供应链平台的顶层设计

数字国际供应链平台的建设与发展涉及生产、商务、海关、金融、外汇、税务、知识产权、市场监管等多个部门，需要“关”“税”“汇”“商”“物”“融”之间的业务协同、资源共享、信息联通，以及体制机制与监管方式等方面的创新。为此，应加强顶层设计和统筹谋划，抓紧研究部署我国数

字国际供应链的整体战略。可联合各相关部门，形成跨部门磋商和协调机制，改变当前治理碎片化、政策源出多门、相互不衔接不配套的现象。

（二）推动政策创新为数字国际供应链平台赋能

数字国际供应链平台是数字经济时代的新业态新模式新平台，要围绕数字国际供应链平台业务发展需要，创新政策与制度安排，为国际供应链过程中涉及的信息流、资金流、物流“三流合一”提供政策支持。例如，针对数字国际供应链平台的跨境数据流动需求，须建立基于分级分类的数据跨境流动负面清单，依托平台技术加强对数据跨境流动的监管，打通间数据壁垒。针对数字国际供应链平台大量跨境资金流动需求，探索建立以平台为主体的FT账户和本外币一体资金池，推动资金跨境流动和国际投融资便利化。针对数字国际供应链平台上大量的离岸贸易和离岸结算业务需求，探索利用数字技术开展贸易真实性审核，外汇管理部门根据贸易真实性创新外汇使用方式。

（三）打造数字国际供应链平台全球服务生态体系

引导我国金融、支付、物流、货代等各类企业伴随数字国际供应链平台“走出去”，形成相互支撑、有机协同的数字国际供应链服务生态体系，大幅提升我国国际供应链的议价能力。鼓励数字国际供应链平台企业，通过平台的货量聚合作用，强化对外议价能力，降低中小企业出海成本，让运输、制造类企业与物流平台企业“抱团出海”，达到多方共赢目标。在支付领域，提供在线融资、在线购买保险，在线支付和本币跨境结算和结售汇等“一站式”金融服务。充分发挥跨境电商综合试验区和数字贸易先行先试带动作用，积极推动数字国际供应链与我央行CIPS结算系统连接，不但可以绕过国际卡组织，甚至可以摆脱由美掌控的SWIFT系统的监控，使数字国际供应链平台成为数字人民币的重要应用场景，成为人民币国际

化的重要平台。

（四）统筹谋划海外仓建设与全球布局

海外仓是数字国际供应链的重要境外节点，是新型贸易基础设施，也是带动外贸增长实现高质量发展的重要平台。特别是在疫情之下，通过海外仓布局拓展延伸畅通外贸供应链，推动跨境物流模式创新。应根据我国构建全球供应链需要，分层次分类别布局建设一批海外仓，形成支撑我国国际物流体系的重要支点。在全球重要自贸港、航空港、海港、中欧班列沿线区域集中布局一批中转枢纽仓、公共仓，引导支持跨境电商和中小微外贸企业在国外中心城市广泛布局一批终端配送仓，同时配套终端配送体系，打造门到门、户到户、仓到仓的全链路一体化国际物流服务网络。同时，也通过数字海关和数字海外仓平台开展贸易真实性审核，为跨境、离岸贸易和结算、退税、结汇提供便利化监管与服务，使“9810”贸易走向“阳光清关”。

（五）积极争当国际规则制定者和引领者

在着力避免全球贸易治理碎片化，减少全球供应链障碍，积极对标国际高标准经贸规则的同时，还要积极争当相关领域的国际规则制定者和引领者。总体看，尽管我国在全球数字经济领域占有较大市场份额，但在数字规则方面话语权较小，规则制定权仍然集中在美欧等发达国家手中。数字国际供应链领域是我国在实践性中已形成的相对优势领域。近年来我国在跨境电商监管制度、便利化措施、支付和物流服务、信用管理等制定方面都取得了规则创新的成果，一些有益的经验做法、模式创造、制度创新可以总体提升为区域规则、诸边规则乃至国际规则。建议积极推动将数字国际供应链平台的相关规则标准纳入WTO、RCEP等多双边贸易协定议题中，以及国际海关组织（WCO）、国际标准化组织（ISO）、国际电信联盟（ITU）等重要国际标准制定中，尽快形成国际互认的规则标准。

责编：险峰 